

“两条道路”的阐释边界及其方法论意义

——基于《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考察

方 瑞

摘 要 “两条道路”方法的科学阐释,是在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在争议中形成的。虽然马克思对这一方法的辩证重构彻底超越了纯粹经验归纳或形式抽象的旧有路径,但在后续学界的阐释中仍存在着混淆“两条道路”的层级关系与功能定位的倾向。为此,有必要回到《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原始语境,重新厘定“从具体到抽象”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阐释边界。马克思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为基础,通过对国民经济事实的系统考察,确立了第一条道路作为经验整理环节的唯物主义前提,从而克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具体与抽象关系问题上的图式化倾向。然而,仅停留于一般的抽象规定,无法把握作为“具体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这就必须通过第二条道路即在思维中系统再现现实的具体,从而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为“两条道路”的阐释功能划定严格的理论边界。这一方法论层面的自觉划界,不仅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科学化的核心环节,也为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依据。

关键词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两条道路;经验抽象;形式抽象;政治经济学批判
中图分类号 A122;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6)04-0093-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3BKS016)

在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中,学界普遍认同辩证法是根本研究方法,并形成了关于辩证法性质的不同阐释进路,其中,历史辩证法与体系辩证法两大阐释路向之间存在明显的理论分歧。前者强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历时性与共时性检视,坚持将分析置于具体的历史进程之中^[1],但这一路向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结构的总体把握,容易导致对历史的抽象化解读和目的论解释。后者则侧重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逻辑,致力于构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结构的理论整体^[2](P32),但其脱离了历史前提的逻辑体系只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表现形式,并不能充分凸显其科学性 with 批判性。二者的理论分歧实质上反映了对“两条道路”功能与边界的不同认定。因此,当前研究的核心在于,如何科学界定“两条道路”的理论边界并重建其内在的辩证关联。为此,必须回到《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原始语境。一方面,考察马克思对斯密、李嘉图等人方法论的批判,明确以“从具体到抽象”作为经验准备环节的唯物主义前提及其理论限度,防止陷入图式化抽象;另一方面,剖析“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在思维中再现“具体总体”的科学过程,划定其作为理论叙述根本路径的逻辑边界,避免脱离社会历史沦为形式抽象。唯有清晰勘定二者的边界与衔接,才能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完整的方法论基础,为构建把握复杂现实的理论体系提供关键支撑。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困境:方法论分化的根源

在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考察与分析中,学界普遍认同辩证法是其主要研究方法。然而,

对辩证法性质的判定,则形成了历史辩证法和体系辩证法两种主要阐释路向的争议。历史辩证法强调,马克思研究方法的革命性在于其深刻的历史性。它坚持经济范畴与规律是特定社会关系的、非永恒的历史产物,主张理论的叙述逻辑应反映现实历史的生成与运动过程,其批判力源自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暂时性的揭示以及对未来社会前景的敞开^[1]。这一路向批评体系辩证法弱化了历史生成维度,力图通过考察社会形态更替和资本演进的历史逻辑来恢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完整历史视野^[3]。与之相对,体系辩证法是一种“将既定总体的内在联系展示出来的方法”^[2](P22),凸显了马克思研究方法的逻辑性与系统性。它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性首要体现在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进程,构建一个再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隐蔽结构与内部有机联系的逻辑体系,以此对抗经验主义的“图式化抽象”^[4]。在这一视域中,范畴间的推演次序主要取决于其在既定社会整体中的理论地位,而非单纯的历史编年顺序。

这两种路向在深化各自论域的同时,也呈现出其内在的阐释局限:体系辩证法侧重逻辑结构的建构,易使抽象上升过程脱离社会历史,潜在地滑向形式抽象;历史辩证法在强调历史线性进程与生成性原则时,可能以宏观的历史性叙事遮蔽对特定社会形态内部结构的精确把握,存在越界阐释的风险。二者产生理论分歧的实质,在于对马克思方法论中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两条道路”的功能、边界及内在关系的不同认定。这一方法论难题,正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内部围绕抽象与具体层级关系所展开的争论。两种看似对立的阐释路向,都根源于前马克思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根本缺陷。基于此,本文通过回溯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评述,并与当前研究路径进行对比,来揭示马克思在构建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为科学界定“两条道路”的阐释边界奠定理论基础。

从思想史的内在脉络看,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核心争议,始终聚焦于如何协调对“内部生理学”的本质抽象与对外部现象的经验描述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造成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未能厘清抽象与具体之间层级关系这一理论困难呢?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斯密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所面对的理论难题予以澄清。为论述国民财富性质及其形成和增长的原因,斯密设立了双重的研究任务:一方面,他试图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学”,揭示其经济制度隐蔽结构中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斯密又想通过合适的术语和概念将社会生活的外部联系叙述出来^[5](P183)。这两种理解方式要求斯密必须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加以分析:既要采用本质抽象法找到相应的范畴,将经济运动规律表达出来,又要运用经验观察法描述和归纳社会生活中各种形式之间的关系。然而,斯密未能在方法论层面自觉到这两种不同研究方法的内在冲突,而是让两者在其理论体系中“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5](P183)。在价值理论上,通过运用抽象方法排除不同生产部门各种劳动特殊形式的干扰,斯密阐发了一种较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思想,即在分工和交换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6](P26)的观点。可是,当斯密转向对现实经济现象的分析时,他继而提出第二种价值定义,即商品的价值由它所能购买的劳动量决定,并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形式。这种二元的价值决定理论,更深刻地反映了斯密在方法论上的困难:他既不能通过纯粹的经验归纳达到对本质的把握,也无法运用科学的抽象把握真实的社会现实。在分配领域,斯密在触及资本主义生产核心的基础上,指出利润和地租来源于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但是,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表象的限制,他并没有对劳动和劳动力进行区分,因而未能发现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本身所具有的创造价值的能力。这样,斯密将地租和利润看作土地和资本的自然报酬,是与剩余价值等同的一般范畴。一旦将工资、利润和地租视为商品的价值来源,混淆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与具体表现形式,就割裂了剩余劳动与利润的关系,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和剥削的实质。斯密理论中的混乱与矛盾表明,将两种方法安排在同一研究过程的作法,虽然“从历史上看是合理的和必然的”^[5](P182),却内在包含着协调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斯密研究方法中的这对矛盾,不仅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困境,更在思想史进程中分化为两条主要的研究进路,分别是以萨伊为代表的“庸俗经济学”的经验观察法和以李嘉图为代表

的“资产阶级制度生理学”的科学抽象法。由此,抽象与具体的层级关系日益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其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理论探讨也为马克思进一步思考如何合理地协调“两条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以萨伊为代表的“庸俗经济学”承接斯密的经验观察法,以实证分析的方式展开政治经济学研究。萨伊在继承斯密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与之不同的理论体系。他批评斯密的《国富论》不仅缺乏条理,而且忽视了对财富消费及分配的研究。作为一门“经过仔细观察的事实,告诉我们财富的本质”^[7](P15)的科学,政治经济学应以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为研究对象,并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于是,萨伊在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中注重从经验观察中提炼理论,并根据观察表述事物之间的联系,引导人们从这些联系中推导出资产阶级生产过程的相关结论,最终构建了一套以“三分法”为核心的理论体系。然而,这种作法导致政治经济学从对人与人生产关系的研究转变为对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研究,以“抽象的、一般的”分析取代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本质的、历史的分析。萨伊虽然捍卫了政治经济学的唯物主义性质,但在马克思看来,他只是把资产阶级的生产过程“按照它表现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图式化的概念规定之中”^[5](P182),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矛盾,最终走上了理论庸俗化的道路。在价值问题上,萨伊摒弃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指出物品的效用才是其价值的来源。他根据对经济生活的观察,表示虽然效用是测量物品价值的尺度,价值却是依靠劳动、资本和自然力三者协作生产出来的。因此,在效用价值论的前提下,萨伊进一步阐发了生产三要素论,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分配问题。可是,当萨伊以“三位一体”公式来说明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报酬的合理性时,就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8](P99),并不能真正揭示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暂时性特征,从而完全陷入了“图式化抽象”的窠臼。这表明,单纯强调“从具体到抽象”的经验起点,若无上升到本质抽象的自觉,必然无法穿透现象,揭示历史的、特定的生产关系。

与此相对,以李嘉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继承并发展了斯密经济学方法中的另一条道路,即科学抽象法。李嘉图以“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规定”^[5](P182)为出发点,从抽象的规定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及其运行过程的剖析。他通过考察其他经济范畴与这个价值规定的矛盾程度,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结构中隐藏的矛盾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抽象法虽然具有“历史合理性”和“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必然性”,但也存在着“科学上的不完备性”^[5](P182)。由于抽象力的缺乏,李嘉图在分析过程中常常跳过必要的中间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5](P182)。例如,在利润与平均价格问题上,由于未能区分劳动与劳动力,李嘉图无法揭示出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转而从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差别中考察利润。一方面,他主张只有投在劳动上的资本才产生利润;另一方面,他又引入“一般利润率”概念,承认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通过一系列演绎,他得出工资与利润共同决定价值的结论,并陷入价值规律与利润平均化规律的矛盾之中。这一混乱的实质则在于他混淆了价值与生产价格:价值是抽象劳动的社会凝结,其向生产价格的转化必须以剩余价值率向利润率的转化为中介。由于李嘉图跳过了资本流通、剩余价值转化等一系列中间环节,因而也就无法理解商品价值与生产价格背离的过程,便错误地认为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原则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由此,这种非历史的抽象方法不仅导致其在叙述上表现出缺陷,而且推导出错误的结论,最终陷入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即便他“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8](P16)当作自己研究的出发点,最终依旧将这种对立视为永恒的自然规律,从而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当作永恒范畴。这表明,单纯的抽象分析如果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规定性和必要的中介环节,同样无法真正把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李嘉图的方法论困境恰恰揭示出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抽象分析路径的根本缺陷,即试图通过形式逻辑的直接推演来把握复杂的具体总体,却忽略了现实自身的辩证运动,从而沦为形式的和虚假的抽象。

通过马克思的述评可知,斯密经济学方法中的内在矛盾呈现出协调抽象与具体层级关系的复杂性

和必要性。萨伊将经验观察路径引向庸俗化,李嘉图将抽象分析路径引向形式化,其结果分别代表了“两条道路”极端化的理论后果。以萨伊为代表的庸俗经济学局限于从具体到抽象的经验起点,其分析始终未能超越对经济现象的表层归纳,未能深入资产阶级的内部去揭示其隐蔽的结构。以李嘉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虽然坚持以抽象规定为出发点展开体系建构,却因抽离了具体的历史与社会内容,最终只能沦为形式的和虚假的抽象。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分化与对立,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论争的核心议题,它们各自的理论困境也凸显出“两条道路”阐释边界的理论必要性。孤立地运用从具体到抽象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中的任何一条道路,混淆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层级关系,都无法完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阐释。也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困难,促使马克思在《手稿》中进行深刻的方法论反思,从而科学地界定从具体到抽象的经验准备边界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建构边界,以实现《资本论》中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结构的“具体总体”的再现。

二、从具体到抽象的边界勘定:对经验抽象的批判

以萨伊为代表的庸俗经济学采用经验抽象的方法整理与归纳各种材料,捍卫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唯物主义性质。然而,这种研究方法只是以“非科学的观察者”^[5](P182)的方式将经济生活的表象描述出来,并没有深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结构揭示其经济运行规律,最终陷入图式化的经验抽象。面对这一困难,有必要重新审视马克思在《手稿》中作出的基本判定,以此反思第一条道路的阐释限度。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指出这种方法“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9](P24)。这一论述似乎否定了第一条道路作为研究方法的正确性。但是,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完全摒弃了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呢?就此,我们需要将其置于18世纪至19世纪初社会科学方法论转型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由传统哲学的抽象思辨和演绎逐步转向对客观规律的追求。牛顿力学等自然科学的突破性进展,确立了科学的崇高地位,并使得经验、观察、实证及数学语言成为研究方法的典范。进入19世纪以后,众多思想家致力于将关于社会历史的知识构建成科学,试图通过经验归纳和实证分析揭示社会运行的普遍规律。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社会科学以牛顿经典力学体系为典范,力图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寻求知识的确定性,以此摆脱抽象思辨的桎梏。马克思基于这一背景,强调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8](P8)的研究。他深刻意识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以对国民经济事实的考察为前提,通过对经验材料的整理与归纳,揭示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与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肯定了从具体到抽象方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认为其在理论构建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那么,马克思又为什么会作出“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9](P24)判定呢?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出发,并通过分析从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性意义的一般规定。但是,这些一般的抽象规定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规定性,“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9](P24)。如果抛开阶级、资本、雇佣劳动等特定社会形式下的历史前提,它们就只是一些无内容的形式抽象。

可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运用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时,存在两方面的理论困难。一是以非科学的观察者的方式去研究资产阶级的生产过程,只是按照其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最终归入图式化的经验抽象。庸俗经济学家以经验观察为方法论基础,试图通过因果分析将社会生活的外在联系描述出来。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仅停留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肤浅解释,未能揭示其内在联系。以萨伊的“三分法”为例,尽管其在形式上构建了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却完全忽视了生产、分配与消费三者之间内部存在的阶级对立与贫富分化问题。在考察劳资交换关系时,庸俗经济学家只是将其视为与一般商品交换相同的商品关系,未能洞悉在看似平等的商品交换关系的背后还隐藏着以雇佣劳动为

中心的剥削与压迫。他们只是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可直接观察和测量的经济事实出发,抽象出一些简单的、看似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规定。随后,这些规定被视为自明的、非历史的实体或自然规律,从而掩盖了其本身正是特定社会关系理论表现的实质。这种以经验主义方法为基础的研究方式,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些从具体中剥离出来的抽象规定,并未触及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隐蔽结构,仍然只是对经济活动表象的再现。这一点在“三位一体公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由“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公式表现出的和谐秩序,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的描述,是对物化的生产要素与收入形式之间直接联系的一种反映。庸俗经济学家们并没有看到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与劳资贫富分化加剧之间的内在矛盾,从而停滞于图式化的经验抽象,完成了对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辩护。二是囿于特定的阶级立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永恒的经济范畴忽略了抽象规定之间的历史差别。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生产的一切时代存在着某些共同的标志与规定,将这些共同点提取出来而获得的生产一般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这个一般的抽象本身包含着许多组成部分和不同的规定,之所以要将它提取出来,既是为了避免叙述时的重复,也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9](P9)。但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9](P9)。他们受到特定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在描述现实的经济活动时,不是将其视为处于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活动,而是抽象为超历史的永恒形式。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特殊规定,都可被当作“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9](P11)。然而,无论是阶级、资本还是其他经济范畴,都必须置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结构中才能发挥作用。在马克思那里,对“劳动”的抽象,不仅是“劳动一般”,更是以“雇佣劳动”这一特定历史形式为前提的、资本关系下的劳动抽象。这就表明,他的“抽象”从一开始就蕴含着对关系本质的批判维度,从而与古典经济学将抽象范畴自然化、永恒化的作法划清了界限。他们那种脱离具体历史环境,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作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的经验抽象,不能对任何现实问题和社会矛盾作出科学的说明,属于一种空洞的抽象。

无论是归入图式化的经验抽象,还是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当作永恒范畴的空洞抽象,都隐含着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方法运用上的一系列理论困难。而对他们的反思,促使马克思形成了使用从具体到抽象方法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一方面,马克思以数学化的表达方式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状况的考察,力图实现对现实社会的精确把握。在《手稿》中,他根据资本各个部分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不同作用,首次区分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基于这一划分,马克思通过数学公式计算了剩余价值率,即剩余价值率等于剩余价值除以可变资本,明确指认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在揭示出资本主义剥削机制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方法——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他通过假设必要劳动时间不同、生产力提高比例相同的条件,计算并比较剩余价值的变化情况。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的增加并非与生产力的提高呈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活的工作日中原来代表必要劳动的部分超出该部分除以生产力的乘数之后的余额”^[10](P303)。借助这种量化分析方法,马克思清晰地解释了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时间与技术创新两种剥削手段以实现价值增殖的现象,并在数学化的语言中确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剥削的内在逻辑。此外,在区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基础上,马克思通过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将技术进步纳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中。由于利润率等于剩余价值与总资本(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和)的比率,当技术进步导致不变资本比重上升时,利润率也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通过公式化的表达和分析,马克思不仅阐明了资本有机构成与利润率之间的动态关系,而且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和经济危机的潜在可能性。可见,以量化分析的方法研究社会生活的经济现象,其目的不在于进行纯技术性的计算,而是为了更精确地揭示隐藏在这些数量关系背后的社会剥削关系与矛盾趋势,防止陷入图式化的抽象规定。

另一方面,在达到对国民经济事实精确把握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这些事实表征的社会关系形式进行

批判性剖析。马克思将经验观察建立在巨大历史感的基础上,始终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众多经济的社会形态中的一种历史形式加以分析。他在《手稿》中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根本错误在于把资本主义生产视为永恒的和自然的生产形式,并将“资本生成的条件说成是资本现在实现的条件”^[9](P109)。这种作法导致的结果是像李嘉图一样,“只看到交换价值的量的规定”^[5](P572),而完全忽视了质的形式。价值范畴不仅是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利润率的计算等数量关系,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它的背后,既隐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阶段性和暂时性特征。其中,雇佣劳动和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核心概念,有特殊的历史前提:一是劳动者与他的生产资料相分离,必须通过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计;二是劳动者摆脱了封建行会的束缚,享受“双重自由”。而这两个基础条件与所有制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只有考察清楚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和发展样态,才能够更好地分析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生成过程。马克思以劳动主客体结合与分离的历史过程为中心线索,系统考察了公社和以公社为基础的所有制解体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阐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历史逻辑。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分析,马克思发现,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是处于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这一历史性定位为马克思把握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定性,达到合理的抽象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在运用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时,其核心任务不在于构建永恒的范畴,而在于通过对处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揭示其中各类经济范畴的历史暂时性。从具体到抽象所获得的每一个规定,不再是一切时代的“药方或公式”^[11](P526),而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体总体”的前提基础。这样,马克思的第一条道路的最终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它不再服务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解释世界并为现存秩序辩护的理论旨趣,而是通过揭示生产关系的暂时性及内在矛盾,指向改变世界的目标。但是,马克思也清楚地认识到,要想在思维中科学地再现作为“具体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运动规律,就必须将由此获得的、具有历史规定性的抽象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中具体化地展开。这也正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第二条道路成为科学的叙述路径的原因所在。通过对从具体到抽象的严格划界,将其从一条经验主义的独立路径,改造为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整理、归纳与占有材料的准备环节,从而为构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三、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重构:对形式抽象的超越

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通过排除混沌表象的干扰,提取出一系列抽象规定。这一方法的运用,坚持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主义原则,为马克思确立精确的研究方法提供了理论前提。但是,这些抽象的规定只是一般的概括和归纳,“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11](P526)。要想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把握,则要以这些抽象规定及其内在联系为出发点,通过叙述经济范畴在思维总体中的逻辑运动,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9](P25)。然而,李嘉图同样从抽象规定出发考察资本主义,却陷入了形式和虚假的抽象。究其根本,在于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并不是一个纯粹逻辑学意义上的方法论转换,而是一种受特定历史科学任务规定的科学叙述方式。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划定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阐释界限,以期深化对抽象与具体层级关系的理解。

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9](P25)。这种方法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理论阐述的方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运用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中,它“只有明了自己的界限时才是正确的”^[12](P398),否则就会像李嘉图一样陷入形式和虚假的抽象之中。不同于注重整理与归纳现实材料的第一条道路,马克思明确地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指认为一种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再现的方法。他在《手稿》中指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9](P25)。这一判定表明了第二条道路的两个基本特征:

一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中的“具体总体”相较于现实具体来看,仍然是思维的结果,它并不能代替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对现实材料的整理作用,“两条道路”都是达到对资产阶级生产过程科学认识不可缺少的环节;二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是思维对直观的和表象的现实具体进行思维加工的过程,并不是对现实具体的同义反复或简单重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通过抽象的方法提取出一系列的范畴规定,但是,他们把这些范畴看作社会的永恒形式,并未将这些规定置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加以分析,因而不能对任何现实问题进行解释与说明。

依据以上限定,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如何展开的。为了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揭示其经济运动规律,他意识到在研究之前必须注意两点:其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中作为起点范畴的抽象不是一种直观的经验抽象,而是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的抽象。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提取一切生产时代共有的某些规定,界定了“生产一般”这一合理的抽象。然而,“生产一般”的提出,并非传统经验主义意义上共性的归纳,而是为了避免叙述上的重复,以及“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9](P9)。也就是说,作为起点范畴的“抽象”不是历史经验主义上的宏大叙述,意图构建超历史的普遍规律,而是通过把握社会形态间的本质关联,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得以充分展开^[13]。由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中的“抽象”需要双重历史维度,不仅能够为理解过去提供借鉴,而且“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9](P110)。例如,货币范畴中的抽象不仅有助于理解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形式,还可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为资本运动的起点和一般等价物的支配性形式。马克思对货币范畴的抽象分析,揭示了货币从简单流通手段向资本进行转化过程中的内在矛盾,最终指向资本积累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危机趋势。通过这种辩证的抽象方法,马克思得以突破古典政治经济学经验方法的局限,避免陷入对历史现象静态、直观的分析之中。这些抽象规定所表明的“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9](P109),促使马克思以阶段性和暂时性的眼光来看待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彰显出其方法体系的批判性和革命性。

其二,要清楚地意识到“表现为结果”^[9](P25)的“具体”包含双重意义,既指代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复杂范畴,又包括思维运动中最终形成的先验的结构。诚如马克思所言,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的最简单的规定不能对任何一个历史的生产过程进行说明。要深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结构,揭示出正确的经济运动规律,就需要进行历史还原,从最简单的规定“回过头来”,以形成“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9](P24)。马克思从两方面入手,以达到丰富的概念规定。一方面,一般的抽象规定在抛开共同点之后,本身还存在着许多丰富的组成部分和不同规定,正是这些规定构成了各种抽象范畴的历史差别。为了更清晰地表述这些历史规定性,马克思将其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适用于一切时代的规定、几个时代共有的规定以及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规定。他批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忽视了这些规定之间的本质差别,错误地将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视为永恒的范畴,因而未能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暗含的内在矛盾。由此,马克思强调,必须将这些抽象范畴置于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中进行考察,并通过增加不同层次的规定性,在具体化的过程中不断贴近真实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范畴的复杂不以概念中包含的规定性的“量”为评判标准。马克思以分析劳动范畴为例,指出“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9](P28)。尽管“劳动”这一抽象范畴适用于一切时代,但就其规定性本身而言,它的深度与广度只有在复杂的社会形式中才能得到最完整的展现,才具备真正的适用性。这表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中的“具体”在形式上可能是简单的,但其内容的规定性只有在复杂的社会形式中才会得到最丰富、充分的发展。因此,当抽象上升到具体时,简单范畴上升到复杂范畴的过程,不仅涉及概念规定本身的具体化发展,而且包含概念所处的社会形式的发展过程。

在完成抽象范畴的具体化展开之后,如何安排这些经济范畴的先后顺序以形成一个结构化的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建构的关键问题。在排列之前,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思维中形成的先验结构只是对现实进行理论把握的过程,而非现实本身的生产过程。这表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对现实生产过

程的一种理论抽象,其本身无法对特定的社会形式进行整体阐释。而这这就要求我们要有意识地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生命有机体。在剖析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9](P23),并通过分析不同要素之间的差异性及其相互作用来把握社会整体的总体特征。理论体系的逻辑顺序必须致力于反映该社会有机体内部各要素之间客观的、由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所规定的内在秩序与联系。这一方法论原则贯穿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整个创作历程,尤其体现在对一系列复杂中间环节的细致分析之中。从《手稿》中以资本为核心的初步演绎,到《资本论》各卷对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平均化、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地租形成等环节的进一步分析,马克思都特别强调,在任何社会结构中,每一种范畴概念都有其特殊位置和作用。各种经济范畴的结构和顺序,不能简单地按照历史发展的线性次序,而是要根据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来确定。那种将范畴的历史发展顺序与理论体系构建顺序相等同的作法往往是错误的,甚至“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9](P32)。那么,应该如何判断这些经济范畴在资产阶级内部结构中的重要性呢?关键在于要把握特定社会形态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生产形式。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存在着一种主导性的生产形式,它如同普照的光决定了社会中其他一些生产关系和社会的总体结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正是这种特殊的以太,它支配并塑造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基于这一方法,在《手稿》中,马克思以“资本”范畴为逻辑基点,通过揭示资本与“商品”“货币”“劳动”等范畴的内在关联,初步确立了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在此基础上,《资本论》进一步构建起一个从商品、货币到资本,再到生产、流通与分配总过程的严密叙述结构。这一结构并非先验的概念推演,而是深刻反映出现实中资本关系对社会结构的支配性塑造。从《手稿》中对资本核心地位的理论确立,到《资本论》中完整而系统的范畴演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结构原则得到不断深化。通过第二条道路,马克思既避免了经验抽象对现实材料的机械反映,又克服了李嘉图式的对历史性规定的消解,最终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具体总体”的科学把握。

这样,通过对“抽象”与“具体”的重新界定,马克思所认可的第二条道路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根本超越。这种抽象不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那种“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9](P11)的形式抽象,而是一种以社会历史发展为前提,旨在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特征的科学抽象。而马克思所说的“具体”,也不再是直观经验层面的表象集合,而是在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包含丰富矛盾关系的结构性总体。唯有依据以上原则,马克思才能克服古典政治经济学非历史性的方法缺陷,以思维中的具体再现出现实的复杂性,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动态发展性,从而避免陷入形式的和虚假的抽象。

马克思在《手稿》中实现的革命性突破,正在于他以巨大的历史感与自然科学的精确性为基础,将“两条道路”重构为不可分割的辩证整体:从具体到抽象是确立研究前提的经验奠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则是在思维中再现“具体总体”的理论完成。二者并非层级替代或领域分立的关系,而是同一科学方法中前后衔接、互为前提的环节。正是通过这种结构化与历史化的内在统一,政治经济学批判才彻底摆脱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一门能够揭示资本主义历史限度与内在矛盾的历史科学。

这一方法论自觉对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具有根本性意义。它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国发展道路时,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阐释越界:既不能陷入滞留于经验材料的实证抽象,也不能走向脱离历史前提的逻辑自洽,而应在系统整理中国实践的基础上,构建能够揭示其发展逻辑的理论总体。唯有坚持“两条道路”的辩证统一,才能在方法论层面真正超越西方中心的理论范式,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为科学把握时代与现实的有力武器。

参考文献

- [1] 温权.《资本论》的社会哲学批判及其历史辩证法内涵.哲学研究,2021,(1).

- [2] 克里斯多夫·约翰·阿瑟. 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 高飞等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 [3] 白刚. 体系辩证法还是历史辩证法——评阿瑟的新辩证法对《资本论》的解读.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3, (5).
- [4] 张盾. 关于《资本论》哲学阐释的几个问题——对阿尔都塞和新辩证法学派的比较研究. 浙江学刊, 2023, (3).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 [6]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上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2.
- [7] 萨伊. 政治经济学概论. 陈福生、陈振骅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 [13] 唐正东. 唯物史观具体化视域中的《资本论》. 南京社会科学, 2024, (12).

Interpretive Boundaries and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Two Paths" Method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ohentwurf, 1857-1858*)

Fang Rui (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cientific elaboration of the "Two Paths" method took shape amid inherent methodological controversies with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While Marx's dialect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is method thoroughly transcended the older approaches of purely empirical induction or formal abstraction, subsequent scholarly interpretations have nonetheless tended to confuse the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 and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the "Two Path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turn to the original context of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ohentwurf, 1857-1858)* to redefine the interpretive boundaries between "ascending from the concrete to the abstract" and "ascending from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 Building upon the precision of natural science and systematic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national economic realities, Marx established the first path as the materialist premise for organizing empirical data, thereby overcoming the schematic bias of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in handling the concrete-abstract relationship. However, mere fixation on general abstract determinations fails to grasp the capitalist social structure as a "concrete totality". This necessitates engaging the second path to systematically reconstruct the concrete reality within thought, thereby delineating strict theoretical boundaries for the interpretive function of the "Two Paths" within the unity of logic and history. This conscious demarcation at the methodological level not only constitutes a core aspect of rendering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scientific, but also provides significant methodological grounding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ntemporary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Key words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ohentwurf, 1857-1858)*; the "Two Paths" method; empirical abstraction; formal abstraction;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 作者简介 方 瑞,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浙江 杭州 310058.

■ 责任编辑 涂文迁